



大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20 December 2005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第六委员会

第 15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03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巴哈先生.....（菲律宾）

目录

议程项目 152：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 2 号 DC2-750 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印成单册。

03-58245(C)



上午 10 时零 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152: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 (续) (A/58/10)

1. **Swords 女士** (加拿大) 谈到国际组织的责任的议题时, 注意到 2004 年国际法委员会将提出关于行为归属的问题。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 4 至第 11 条中处理了与行为归于国家有关的某些平行问题。委员会要求各国政府对三个特定的问题发表意见。第一个问题是, 行为归于国际组织的一般规则是否应该提到“组织的规则”。条款草案第 4 条在提到“国家机关”的行为时, 涉及了有关国家的国内法问题。根据同样的逻辑, 就国际组织的机关或者其他类似实体而言, 可能很有必要提到“组织的规则”。

2. 关于第二个问题, 加拿大认为 1986 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 (j) 项中对“组织的规则”所下的定义是适当的。根据该款, “组织的规则”的意思是“特别指该组织的组成文书、按照这些文书通过的决定和决议, 以及确立的惯例”。然而, 应该明确, 如果委员会依照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框架, 提到一个组织的机关, 和建立它们所依据的规则, 它还应处理这些规则中没有提到的、有关行为责任的归属的问题。委员会还应处理关于个人或者行为者而不是机关代表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及超越权限的行动的问题。

3. 关于维持和平部队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归于派遣国, 在多大程度上归于联合国, 加拿大认为, 这可以取决于事件的情况和联合国与派遣国之间的安排。联合国可能将会员国提供的人员视为 1946 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中定义的为联合国执行任务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 将他们的行为的责任归于联合国是合理的。但是, 在其他情况下, 可能很明显, 国家的分遣队的行为代表派遣它们的国家。在

这个问题上应该考虑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联合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这些个人的行为。尤其是由于这种情况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 8 条中设想的不一樣。

4. **Mezeme Mba 先生** (加蓬) 回答委员会关于行为的归属问题, 特别是, 是否可以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提到的国内法的概念类推“组织的规则”。他说, 加蓬认为建立国家的国内法和国际组织的“内部法律”这两个平行的概念是合适的。前者的内容包括规定国家法律秩序的法律和法规, 相似地, 国际组织的内部法律的内容包括管理它们的组织和运作的规则。然而,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中包括的“组织的规则”的定义并不令人满意。这是因为, 在涉及责任的问题上, 最好采用应用范围尽可能广的定义。《维也纳公约》中使用的“组成文书”的用语是有限制的, 可能会引起混淆, 因为这只是建立国际组织的条约所可能采取的形式之一。更好的方法是, 使用一个更一般的表述, 特别提及组织的运作规则。

5. 关于维持和平部队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归于联合国, 这种情况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8 条中提出的, 将一个国家交由另一个国家支配的机关的行为归于另一个国家的情况相似。然而, 这种解决方法可能不太令人满意, 因为必须明确区分维持和平人员与他们的任务有关采取的行为以及属于他们私人生活的行为。在第一种情况下, 联合国应该承担责任,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 应由派遣国承担责任, 尽管后者可以对进行伤害行为的个人采取行动。然而, 后一个问题属于国内法的范畴。因此, 委员会也可以利用联合国与派遣国之间的协定中建立的责任制度。

6. 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条款草案是基于早些时候对国家责任的工作的基础之上, 它只包括了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的责任, 并不要求存在任何损害。他想知道

道委员会是否在设想，是否可能研究一下国际组织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的责任。关于条款草案的第 1 条，他感到高兴的是第 2 款扩大了国家责任制度的范围，新增加了那些可归因于一个国际组织的行为而产生的责任，因为这将有助于填补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空缺。关于条款草案第 2 条，国际组织的定义会引起争议，因为它是基于三个标准：这个组织必须由一个条约或者其他国际文书建立；它必须拥有自己的国际法律人格；它的成员必须是国家或者其他实体。在原则上，是建立国际组织的条约赋予了这个组织以国际法律人格，并授予它采取与其组成实体不同的行为的权力。另外，很难建立正式的规则，规范如何识别一个特定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因此，提及国际法律人格的标准是多余的，而且将不必要地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规则的定义复杂化。最后，“实体”的说法含糊而且不准确，应该用明确的方式加以定义。他的代表团完全同意条款草案第 3 条。

7. 关于报告的第六章，加蓬反对提前而且在理论上限制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自身的报告的长度。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令人满意，这体现在报告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这两章分别论述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工作，和委员会特别想听取各国政府发表意见的问题。对此，他强调，各代表团有必要向委员会提供关于所提出的问题的尽可能充足和清楚的信息。

8. **Wood 先生**（联合王国）说，他完全支持昨天代表欧洲联盟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这个话题的发言。委员会充分考虑各种国际组织的惯例和它们关心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欧洲的机构可以提供很多信息。与委员会目前正在讨论的条款草案相类似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让委员会花去了几十年时间，尽管国家责任条款所指的是国家——一个在国际法中清楚而统一的概念，而且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很多研究。现在的这个话题指的是

一类国际法人——国际组织，它们在功能、权力、地位、权利和义务及其与成员和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巨大的差别。而且，这是一个惯例、判例法和专门研究都相对不足的领域。基于这种背景，委员会应该首先收集并研究整个领域存在的材料，诸如从联合国秘书处的法律机构、专门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其他国际和区域机构例如欧洲共同体，以及从国家和学术界获取的材料。一旦进行了这项工作，就有可能分清哪些领域已经可以进行编纂，哪些尚需进行进一步研究。对于这个主题应该进行更多思考，因此，回顾国家责任条款的所有部分，并看看目前的情况下对出现的问题的重要性将是有帮助的，而不要简单地用经常采用的修改词句的方法重新阐述相应的条款。

9. 委员会向国家提出了有关行为归属的三个特定问题，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假设“国际组织的机关”的概念是核心，他想知道，如何定义这样的机关，这一定义是否会包括依照“组织的规则”，具有机关地位的任何人或实体。国家的国内法和组织的规则有明显的区别，因为组织可能不会存在例如任何得到授权可以改变或者阐释这些规则的机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就此出现了不同意见，那么应该由谁来决定，一个实体是否属于这个条款所述的机构。至于第 3 个问题，“维持和平部队”的说法包括各种不同种类的部队，而且它们可能是为各种不同的组织执行任务，它们与这些组织的关系也各有不同。这些组织可能在授权、权力和结构方面有很大不同。而且，在组织和派遣国之间通常有一份特定的协定，规定了各方之间的基本关系。

10. 最后，关于至今已经通过了的三个条款，第 1 条明确指出，委员会想要规定的不仅是国际组织而且还包括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行为负有的责任。在关于国家责任的问题的工作中，这明显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由于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差异，令人怀疑能否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研究。

对于第 2 条，他认为不可以违反以前编纂工作中“国际组织”的非常简单的定义。最后，第 3 条简明易懂，没有争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国家责任的条款轻易用在例如国际组织的责任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11. **Telalian 女士**（希腊）认为，国际组织的责任的问题是随着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产生的，有关国家责任的规则可以经过必要的修改应用于国际组织。关于处理这个问题的范围和一般原则的条款草案，委员会正在提议给“国际组织”下一个新定义，它既不以一个以条约为基础的组成文书的存在为基础，也不以这个组织的政府间的特征为基础，而是反映当前的现实，因为国际组织也由那些在法律上或政治上有约束力的文书建立，而且有不同种类的成员，包括国家和非国家实体。这个定义的另一要素是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这应该与其成员国的法律人格区分开来。这个要素体现在第 2 条中“拥有自己的国际法律人格”的措辞中。她满意地注意到，特别报告员不仅详细说明了国际组织单独的法律人格，而且还处理了很多其他问题，例如是否应将国际组织视为作为其成员的代理行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根据国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第 4 条和第 5 条，它的行为应该归于有关的一个和几个国家。特别报告员关于国际组织的职能的陈述非常恰当，而且她也同意委员会的观点，认为委员会只应处理根据国际法负有的责任。

12. 关于行为归属的条款草案，她大体上同意第 3 条的内容。第 3 条以国家责任草案的第 1 条和第 2 条为基础，并用违反一项国际义务和不法行为归于国家这两个标准来决定一个国际组织的责任。将行为归于国际组织的一般规则，应该提到“组织的规则”。国际组织的非法行为是无效的，没有法律效力，而且应该认为这个组织对造成的任何损害负有责任。《维也纳公约》中的“组织的规则”的定义为这

个条款草案的目的是适当的，因为组织已经建立的惯例在决定归属时是一个重要因素。

13. 关于维持和平部队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归于派遣国或者联合国的问题，与一个国家对一个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所负责任的问题密切相关，委员会不反对在这个问题上阐明原则。如果维持和平部队由联合国管理和控制，维持和平部队的成员违反国际义务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属于本组织的责任，而不是会员国的责任。然而，由于维持和平任务的多样性，国际法委员会应该记住，在会员国负有并存的或者次要的责任的情况下，也有将行为的责任归于本组织会员国的可能性。

14. **Mathias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感谢奥地利和瑞典旨在重振关于委员会工作的讨论的倡议。

15. 国际组织的责任的问题是复杂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类组织的多样性。它们不仅在职能上，而且在结构上和概念上都有不同，这就使为本主题的目的给“国际组织”下定义显得很困难。美国打算就其定义发表书面评论。

16. 关于行为的归属问题，委员会应该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辨别国家、国际组织、审判和仲裁法庭处理这种问题的方式。在维持和平部队这个特定的问题上，在起草条款草案之前，评估这个领域所有惯例将是非常有用的。最后，国际法委员会不应该只局限于将国际组织的规则修正得类似于国家适用的规则。

17. **Troncoso 先生**（智利）回忆到在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上，他的代表团曾说，国际法委员会应该将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作为审议国际组织的责任时的指导。第 1 条定义了条款草案的范围，也就是其适用范围，主要是指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的情况，但是没有提到组织自身的违法行为。应该强调，将组织的不法行为的责任归于国家应该是一个例外，因为组织应该对其自身的行为负责。因此，他建议，条

款草案应该声明，其内容“在适当时”将应用于国家，并明确指出在哪些情况下这样的责任将被归于国家。他同意委员会提交的第 2 条的内容，其中给“国际组织”下的定义，是基于定义这种实体使用的传统要素的基础之上。但是，没有指出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在自身能力范围内行使某些政府职能”的词句为什么被省略了。

18. 关于第 3 条一般原则，省略了内部法律，因为国际法委员会考虑到，违法行为的描述不会受到组织内部法律的描述的影响；将这个原则转移给国际组织是困难的。他怀疑这样的省略是否恰当，因为虽然这个组织的一些文书构成了国际法，但是它的很多内部规则却没有，例如它的运作规则。

19. **Baker 先生**（以色列）在提到国际组织的责任时说，可以从国际法协会的委员会的工作中寻找指导。在条款草案第 1 条第 2 款，应该明确说明，只有当一个国家是国际组织的成员或者机构时，这个国家才对该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负有责任。“文书”的说法需要进一步思考，因为作为决定一个国际组织的存在的一个标准，它看起来太广泛和模糊。而且，第 2 条中提到“实体”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这似乎过于简单化了。根据目前的惯例，只有当一个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明确宣布实体可以成为其成员时，实体才能成为一国际组织的成员。实体变为国际组织的额外成员在“实践中有明显趋势”的说法似乎太宽泛，应该给予进一步证明和评估。委员会的工作应该将注意力放在政府间组织上，因此，将第 2 条的第二句话删除是更可取的。

20. 关于归属的规则，提到“组织的规则”是很有用的，它规定了组织的人格、授权和权力。国际组织的规则当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提法可以有助于区别现存的各种不同组织的权力和责任。而且，一个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既由它的章程又由它的惯例决定，这应该在相应的条款草案中体现出来。关于

委员会的第二个问题，《维也纳公约》中规定的“组织的规则”的定义似乎特别合适，因为它允许适当区分每个组织的国际责任。

21. 关于第三个问题，他同意那些对在现阶段提出维持和平部队的问题提出置疑的代表团的意见。维持和平的任务可能有很大差别，在详细阐述一般标准之前，最好不要在复杂的具体事件中陷入困境。联合国的一支维持和平部队的作为和不作为的责任当然应该由本组织自身来承担，至少是在它对部队实施有效控制的时候。当部队在“组织的规则”内行事时，符合逻辑的结论应该是由联合国承担法律责任，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维持和平部队的存在和其进入一个国家的领土，是这个国家同意联合国进入的结果。然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组织的规则、惯例、有效控制的问题，以及是否存在一个关系协定。还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联合国和派遣国无法有连带的或者并存的责任；这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和本组织的关系，以及在任何情况下实施的有效控制。总体目标是详细阐述确保进行不法行为的一方，不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承担责任的规则。

22. **Curia 先生**（阿根廷）说，他的国家完全支持奥地利和瑞典旨在重振就委员会的报告所进行的辩论的提议。他的代表团也赞同那些强调需要在适当时间公布报告的代表团的意见。

23. 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有些概括，可以改得更加明确或者具体。

24. 关于需要承担责任的行为归于国际组织，阿根廷认为，使用《维也纳公约》中“组织的规则”的定义显然不合适。一个国家无法援引该国国内法中的一个规则为它没有履行国际义务辩护；与此类似，一个国际组织无法援引它的内部运作规则中的一个规则来为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行为辩护。

25. **Tavares 先生**（葡萄牙）说，委员会已经指出了对于每个话题，特别想听取各国政府发表的意见的具体问题。因此，他欢迎奥地利和瑞典旨在重振第六委员会就委员会的报告所开展的辩论的倡议。

26. 国际组织的责任这一主题是复杂的。紧随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是一个好的起点，但是必须记住，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各个国际组织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它们在很多方面与国家不同。葡萄牙支持代表欧盟所作的发言，并且同意第 1 条和第 3 条现在的措辞。关于第 2 条，他同意委员会决定采用一个只用于本条款草案的定义。然而，应该对这一条提到的参与国际组织的实体而不是国家，进行仔细考虑。虽然这样许多此类实体的确参加了国际组织，但是它们通常是作为联系成员或者附属成员，而不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考虑到条款草案的第 1 条第 2 款，需要明确在什么情况下，这样的实体将承担一个国际组织的行为的国际责任。他请委员会进一步思考国际组织可否由受国际法制约的其他文书建立这一问题，考虑时应记住需要将真正的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的下属机构区分开来。

27. 他对特别报告员打算在下一个报告中处理有关归属这一复杂议题表示欢迎，并同意国际组织行为归属的一般原则应包含“组织的规则”。1986 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j）项中有关这些规则的定义是恰当的起点。然而考虑到定义包含“特别”字眼的事实，应考虑对组织的规则的其他部分进行评估以形成较详细的定义。提到组织已建立的惯例也值得进一步关注。维持和平部队的行为归因于派遣国还是联合国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这有可能出现与其他国际组织有关联的问题，也就是那些在维持和平任务中援助联合国的组织。第二，本组织和派遣国达成的协定有可能包括责任归属问题的特别条款。最后，在对涉及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可

能的责任关系做任何决定之前，都应认真考虑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惯例。

28. **Tarabrin 先生**（俄罗斯联邦）说，他的代表团对委员会在其第五十五届会议上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特别是关于外交保护和启动国际组织责任工作的问题。虽然这些组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其行为的很多方面仍存在争议。委员会在审议该问题时所采取的一般做法值得支持，特别是它决定将有关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作为工作的基础。该决定有可能将工作范围限制为审议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而搁置实质责任问题：国际组织行为中的国家责任的问题迫切需要一套条款来管理。

29. 这是第一次试图明确表达国际组织概念的实质法律定义。很明显，这一概念必定成为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的重点。在委员会的讨论中，有人对条款草案需要背离国际组织的正式定义表示怀疑。国际组织是一个政府间组织：该定义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国际公约中，比如：1986 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和 1975 年《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他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些怀疑。然而，因为条款草案特别指出政府间组织是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际组织的惟一类别，所以这并不是担心的原因。关于定义的其他方面，国际条约的存在或者国家是成员国的事实，只有在为确定国际组织存在法律人格的时候才是必需的；也可以转成评注或者包括在单独的条款中。

30. 关于国际组织的行为归属，根据国家责任条款中确立的原则，依照国际法行为归于国家。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国际组织，请记住大部分的国际组织的规则均是国际法的一部分。没有理由认为《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

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 (j) 项中的“组织的规则”定义是不恰当的。

31. 关于维持和平部队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归于派遣国或者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其一份有关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报告中提到了涉及这一问题的两个案例：第一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武装部队在美国的指挥下，以联合国的名义于 1950 年在朝鲜执行了行动。第二个发生在刚果，由国家分遣队组成的联合国部队在联合国指定的指挥官的指挥下在刚果进行部署。在后一个案例中，行动导致损失的责任被认为由联合国承担。而在第一个案例中，美国愿意为损害提供赔偿。基于这些例子，特别报告员的结论是，确定责任由国家还是组织引发的决定因素是“有效控制”原则。他的国家同意这一结论，尽管这并不排除需要对该问题进行更全面的研究，特别是行动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如果组织决定批准非法的军事行动，那么它应当和执行行动的国家一起承担相应责任，而不考虑它是否实施了有效控制。

32. **Yáñez Barnuevo 先生**（西班牙）说，委员会的 2004 年报告应简要说明 5 年期的目标，暂时不需要列入新的议题。

33. 关于国家的国际责任，国家既是责任关系的主动主体又是被动主体；换句话说，国家有时是承担责任的主体，有时是受害主体。然而委员会的报告提到国际组织的责任，也就是国际组织作为可能的承担责任的主体，但是哪个实体将是被动或者受害主体并不明确。原则上，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国际组织，它可以是任何国际法主体。很奇怪，没有人考虑相反的关系，也就是国际组织可能是受害主体，而国家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委员会应更进一步考虑这一基本问题。

34. 除了国家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之外，委员会还应考虑目前的惯例和某些理论工作，比如国际法协

会进行的工作和葡萄牙—西班牙—美洲国际法协会对国际组织和责任关系进行的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组织既被认为是主动主体，也被认为是被动主体。委员会在处理条约法问题时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委员会首先编纂了国家间的条约法，从而通过了 1969 年《国家间条约法维也纳公约》，随后通过了 1986 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因此，对国际组织的责任关系的法律，包括组织间的责任关系和组织与国家间的责任关系，进行全面研究是明智的。

35. 关于方法论，将国家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作为起点非常重要，但是必须牢记在国际法律秩序中，国家是充分具有一致特性的主要主体。另一方面，国际组织是国家建立的第二主体，在建立方法、特性、权力和运作方式等方面都具有多样性。因此，需要在这些方面研究国际组织的惯例，并仔细分析它们的活动中可能出现国际责任问题的领域。

36. 国际组织，至少那些作为真正的国际法主体的国际组织，原则上具备主动或被动分担涉及国际责任的法律关系的一般能力，但是在其法律人格以及权力的内容与范围的限制之内。

37. 关于委员会暂时批准的条款，可以草拟一个条款，来界定新的条款草案与国家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之间的关系。而且第 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之间似乎有一些矛盾的地方。第 2 款的范围需要进一步考虑。

38. 关于第 2 条，委员会很明显不满意其他成文公约中“国际组织”这一术语的定义。将国际组织仅仅定义为“政府间组织”是不恰当的；更恰当的定义应当是“国家间组织”。委员会提出的定义同样不令人满意。前一部分可以作为起点，但是最后一句特别不恰当。法国提出的备用版本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可以作为形成可接受的措辞的基础。现在讨论的国际组织是由国家建立，而且主要由国家构成的

国际组织。这是处理剩余的国际责任问题的惟一办法。

39. 第 3 条在原则上可以获得批准，尽管也许还需要根据后边的条款进行更仔细的检验。

40. 对于委员会关于将行为归于一个组织的问题，应拟订不影响随后拟订关于本主题其他有关方面的具体规则的一般规则。一般原则应该提到“组织的规则”，因为这是强调将行为归于组织的基本设想。然而，应采取措施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个实体实际上是一个国际组织的机关之一，但是这个组织仅仅根据组织的规则否认该实体是一个机关，就试图逃避这个实体的行为的责任。因此，需要客观地或根据第三方的观点来确定为组织或代表组织行事的个体或者实体的身份。最好从 1986 年和 1975 年《维也纳公约》中包含的定义开始研究“组织的规则”定义，特别是前者。在那个定义中，需特别注意提到的“组织的规则”，它大体上在保留每个组织的特点方面有优势，而且并不影响组织的规则构成组织真正的内部秩序所需的系统化程度。在这方面，他完全支持意大利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和委员会代表的发言。

41. 关于维持和平部队的行为，他同意很多发言人的意见，即关注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这一问题不是，或者说不应该是单指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因为区域或者其他组织在这些领域也很积极。委员会应全面研究现有的惯例、国际组织与派遣国间的协定、这类行动的东道国的惯例、安理会的惯例、处理特殊地点的要求的协定，以及现有的初步仲裁惯例。控制是关键，虽然众所周知，控制的概念在国际法中是有争议的。就维持和平部队这一情况来说，关键的概念是行动或运作的控制，但是这个问题应当在他的国家提议的研究中确定。西班牙保留在随后递交委员会的书面评论中就此进行更全面讨论的可能性。

42. Kamenkova 女士（白俄罗斯）就国际组织的责任说，行为归于国际组织的一般原则应提到“组织的规则”。从法律的观点看，组织的规则非常重要，不论是对于管理国际组织活动中出现的机构间问题，还是对于定义其机关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其机关和组织的官员之间的关系。考虑到组织的规则的适用范围，这些规则在处理组织机关或者官员的国际不法行为归于组织的问题，以及界定国际组织和国家的责任时非常有用。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j）项中“组织的规则”的定义包括了国际组织管理其内部运作和有关它们的活动的主要的规范的方法。在将行为归于国际组织时，考虑的惟一规则就是那些具有特别重要的法律意义的标准特征的规则，这一点应该在条款草案中明确地反映出来。

43. 限定联合国与派遣服从联合国管理的军队、警察或者民事分遣队参与维和行动的会员国之间的责任范围非常重要。这方面存在两个问题：联合国人员在维和行动中，因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造成损害，以及违反国际法标准和超越特定行动的授权的行为造成损害的两种情况下，联合国和派遣国的责任比例如何分配。第一种情况，派遣国承担的责任应根据其分遣队实际参与造成损害的行动的程度，在各派遣国之间进行分配。第二种情况，问题的起点应该是维和行动的授权，以及行动中联合国全面领导和进行控制的效率。相对于联合国的责任，国家因其分遣队违反国际法的规则和行动的授权的要求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的责任，可能是第二位的或者是剩余的，只要相关国家并没有直接介入该行动。

44. 最后，她表示对委员会报告中条款草案第 2 条评注第（14）段持保留意见，因为国家作为国际组织成员的国际责任只有在一个国家是该组织的成员国时才发生。如果一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一道进行了国际不法行为，那么其对这个作为非

组织成员国的第三国的单独实质责任不能完全免除。条款草案中未能包括国际组织成员国的责任的规则，这将给国际法律责任制度，以及国家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管理留下很大的空白。关于国家对国际

组织的特定行为应承担的实质责任，这一问题可以在相互团结原则和剩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在条款草案的框架内解决。

中午散会